

壹、問題背景

日本民間於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曾經興起一陣興建另類學校（free school, alterative school）的潮流，當時日本社會正面臨日益嚴重的「不登校」（truancy）問題（此為原文，以下以中譯「拒絕上學（拒學）」稱之）。這些另類學校有別於體制內的學校，多數為非法自由結社團體，其經營者為學生家長與教育界退休人士，他們批判體制內的教育系統腐敗，轉而提倡新自由主義的教育理念，冀望能夠解決拒學問題。

文部科学省（等同臺灣教育部）將拒絕上學定義為「基於心理上、情緒上、身體上或社會因素與背景造成學童無法上學，或是想上學卻無法上學（排除疾病與經濟因素）」，規定1年內若累積缺課達30天以上即通報成為拒學的案例。日本自1990年代起，拒學學生人數開始逐漸攀升，2001年時人數達到最高峰，人數占當時全國總學生數的12.3%，之後人數雖然逐漸減少但仍然維持在11.0%左右。小學生的拒學比例近20年來皆維持在5.0%以下，然而中學生拒學比例自1998年起日益增加，在2000年後皆維持在全國中學生數25.0%以上，可見得拒學問題是以中學生居多而且相對嚴重（見圖1）。

面對此異常狀況，日本政府卻未能即時認知問題的嚴重性，遲遲未能採取對應措施，文部省（今文部科学省）於1983年出版的《生徒指導資料第18集》中將拒學稱為「登校拒否」，將原因完全歸咎於學生個人心理因素及家庭背景，全然否定與學校制度之間的關係（文部省，1983）。然而當時許多學生之所以拒學，主要原因多出於校園暴力與霸凌，也不乏教師的不當管教，只是這些問題並未獲得官方的關注與校方的解決，所以當時甚至發生多起社會案件，例如，1986年東京都中野區的富士見中學曾發生學生因不堪教師與同學的霸凌而自殺的事件（王美玲，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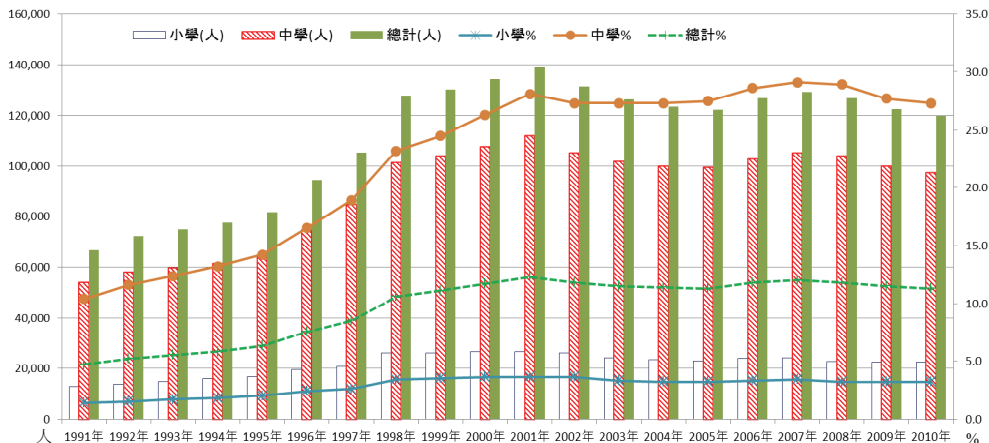


圖 1 日本拒學學生人數與拒學比率

註：左軸為拒學學生人數（單位：人），右軸為拒學學生占全國總學生數的比例（單位：%）

資料來源：文部科学省（2013）。

即便日本政府緊急規劃對策，於1988年增設師資名額以加強輔導，隔年成立學校不適應對策調查研究合作委員會，並於學校外設置適應指導教室（類似中途班）來因應拒學學生的需求，然而一連串的社會案件已造成家長與學生對於體制內的教育制度灰心甚至於不信任，因而轉向尋求體制外的協助，另類學校便順應而生。這些另類學校提倡非學校思想，標榜拒學並非單一個人之問題，應該由社會大眾一同來解決。有鑑於此，學校不適應對策調查研究合作委員會於1992年歸納初步的研究成果後出版《拒學對策》，正式將學生不去上學的現象稱之為「不登校」，排除學生的個人特質及家庭因素而找尋真正不上學的原因，重新認知「任何一位學生都有可能拒絕上學」的事實，同時也發表了《民間設施指導方針（草案）》，將另類學校等體制外教育機構稱為民間設施，明文規定經營上的準則，並首度提出在體制內學校的校長核准之前提下，認同學生在民間設施的出、缺席可代替原設籍學校的紀錄。